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佛

教与晚明文学思潮

教与晚明文学思潮

黄卓越 著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東方出版社

# 佛

## 教与晚明文学思潮

黄卓越 著

東方出版社



◎ 学 库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责任编辑:孙 涵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任宗英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黄卓越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0

(日晷文库丛书/吴先宁主编)

ISBN 7-5060-0823-8

I. 佛…

II. 黄…

III. 佛教-关系-文艺思潮-明代

IV. I209.48

## 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

FOJIAO YU WANMING WENXUE SICHAO

黄卓越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95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060-0823-8/B·111 定价:15.00元

## 总 序

东方出版社与吴先宁同志共同合作，经周密考虑与多方联系，约集近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组织出版一套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著作，第一批共十二种，起名为《日晷文库》。我觉得这一丛书的名称很有特色，它不但是比喻中华古典文学还如日行天，灿烂辉煌，照耀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祖国大地，而且象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研究群体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全身心地投入这一蓬勃向上的精神领域，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这是本世纪前80年所未曾有过的。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前几年在学术界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具体展开。但我们的研究实践却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注意史的发展线索，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作家，而是连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段。这就不是作家评论的程序汇编，而是文学群体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作家之间的关系（如新老作家的交替，文人集团的友谊与冲突），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消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创作风格的变化，不同文体的代兴。这之中，

群体与时段的研究,是这些年来最出色的成绩。有谁在这方面下了工夫,他的著作就能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即使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是孤立的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流动着的文学环境,有一个层次不等的群体,即使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也是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家族的。

这种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在年轻研究者中,已经形成一种冲力,那就是要从过去占很大优势的局部、个体研究中挣脱出来,对文学的长时期发展阶段作出整体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表明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反映这一代学人所特有的对文学命运的关切与忧思。

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正如19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当然,我们这样做,不仅要考虑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更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特色。它不是使文学隐没,而应是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

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是最可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进行一些探讨,那么这个文化意识问题就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新的课题。

我觉得,从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套丛书,可以说现在这十二种著作正是从总体上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与年轻一代的创新气度。这十二种书,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开始,一直至明清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从思潮、流派、群体出发,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进行清理,重在清理事实,而不简单地品评高下,不单纯立足于点的深化,而在于线的连续;与此同时,又善于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的中介环节,使我们接触到那一时代、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自80年代中期起,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为数不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培养出来和成长起来,这已构成我们今天古典文学界的一代研究者,他们无论从治学道路、理论观念,以及精神气质、学术兴趣等方面,都表现出与80年代以前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已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and 学术品格。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对传统研究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对现状的研究,而现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这十余年来这一研究生群体的研究,研究他们和他们的著作,与研究古典作品本身有同样的意义,同样的价值。特别是这90年代以来的一批博士研究生,他们之中不少人更注意广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和观念,而另一方面又努力对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文学史料作沉潜的研索,这种勤奋的实证训练是足以支撑他们作大幅度的理论探索的。当然,在这之中,需要对现实社会中的市场冲激与贫富差距有理性认识,要有左思《咏史》诗中所说的“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的心理准备。我想,这十二种著作产生的本身,就足以表明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为学术而奉献的文化素质。

这套丛书的总序应由丛书主编吴先宁同志来写的，我推辞再三，但吴先宁同志与东方出版社还是希望我借此谈谈对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与前景的看法。吴先宁同志是曹道衡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编委中傅刚同志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曹道衡先生，而曹先生则是我的学术至交。编委中的钱志熙同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我都分别在杭大和北大参预评议。过常宝同志关于楚辞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我应聂石樵先生之邀到北师大去主持答辩的。黄仕忠同志虽在中山大学，但与我早有文字交往。我很感谢他，我在1962年所考的关于《琵琶记》作者高则诚卒于明朝立国之前一说（《文史》第一辑《高明的卒年》），得到他的赞同并给予进一步的补充论证。因此可以说，我有缘与这几位年轻博士生有学术交情，因此也就不自量力，为这套将能受到读书界注意和欢迎的《日晷文库》撰写此篇小序，谨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傅璇琮

1997年3月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

 学文库 • 学术编辑委员会

---

● 学术指导 聂石樵  
钱仲联  
章培恒  
曹道衡  
傅璇琮  
(按姓氏笔划排列)

---

● 主 编 吴先宁

---

● 编 委 方 鸣  
傅 刚  
过常宝  
钱志熙  
黄仕忠  
孙 涵



 学文库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



# 目 录

## 上编 晚明文学思潮涉佛的总体考察

第一章 晚明文学思潮之性质溯源	(3)
第二章 运动过程与思想影响	(25)
一 启动段	(27)
二 推进段	(37)
三 突进段	(49)
四 转折段	(60)

## 下编 重要命题解析

第一章 心源说	(86)
第二章 童心说	(105)
第三章 性灵说	(128)
第四章 主情说	(156)
第五章 自适说	(182)
第六章 无法说	(215)
第七章 白苏论	(234)
后 记	(253)
主要参考书目	(255)

# 上 编

## 晚明文学思潮涉佛的总体考察



## 第一章 晚明文学思潮之性质溯源

晚明文学思潮作为一长时段的历时运动，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文论史上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分量，这个分量并非以其覆盖了一无可替代的历时长度，而是由其既已获取的历史特性决定的，因而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对此特性的充分揭示。但既然是特性，也就意味着它就整段（文学）历史来说不可能是包罗万象、巨细无遗的，而首先是一种分类研究，即一组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材料的系统研究。然而，即便是在这一系统中，不仅现象本身具有相当驳杂与散漫的品性，又往往歧支多出、边界含混，从而使识解活动难以进行。因此，就需要经由一番与材料抗争的过程（有所取舍与提炼等），努力把握住其主导性的态势，即某种有特质意义的抽象主旨，进而使范式“构造”成为可能。就我们的研究范围而言，所谓的“晚明文学思潮”表述的即是这种态势或主旨。

以这种观念再次复审所要研究的对象，整个思潮的时程脉络就会十分清楚。时程与特性两概念应当是一致的，特性恰如其分地规定了时程的长度。但是首先，这一时程是分类学意义上所指的时段，而非历史编年学所指的时段。编年体时段，即“晚明”这一概念的前限在学界一直未有严格的定说，有以万历始，也有以嘉靖始的，无论按何种标准，晚明的历史编年时段与我们在此所称的晚明文学思潮的分类时段都是难以吻合的。据考察，作为运动的真正发动，已是嘉靖十年以后的事，故体现特性的时程也当

是指嘉靖中至明末这一历史阶段。再者，以嘉靖中为思潮的前限，并非认为晚明革新是完全突发性的，而是指由此时程的端点看，晚明文学思潮正式进入了其特性的展露期，革新成员开始有意识地构筑有别于旧文学的新范式，尽管此前已有高叔嗣等人转变文风的影迹，特别是我们将要不断提到的，在另一领域中，心学的建立已经为文坛革新准备了十分充分的思想资粮，但是具体落实到分类考察的对象，则应以其自身典范的运动程序作为时程确立的依据，从而提供形式上的说明性标志。

然而，这种表面的分类学概念仍只是起着划定研究对象学科范围的意义，比如告诉我们的只是晚明文学运动及其主导性向，而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却是远远超出了这一分类特性的规定，晚明文学运动（而非一般所说的晚明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特征性的举动，它的中心旨趣恰恰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指向文学之外的意义，并通过对这个意义的阐述来重新改造文学的功能，反对文学系统哪怕有一点可能的独立。准确地说，作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都首先是出于超越文学之外的一种对他们来说是更为迫切的关怀，并受到了这一思想导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后以此再反观文学，希望文学能与这一思想同步，有助于这一更重大意义的实现等。因而，运动的意义事实上就是外攫的，这样，表面的分类也仅只有学科标识的作用，而整个运动的“特性”便推出了自身的界限，与更深广层次上的意义紧密钩连在一起，或可以说，我们所说的“晚明文学思潮”作为一个次属分类，将是更阔大的“晚明思潮”分类的一部分。在意义表述上，尽管仍作为单独的类例有其相对的特征，并可能由此溢出总体思潮思维旨趣的方向，但其深度模式却与总体思潮同构，它坚执地要去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与后者一致的，这就自然地先将其引到了与佛学关系的考察平面之上。

在考察这一关系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学界的情况。中国传统思想格局长期以来为儒、释、道三足鼎立,但魏晋以后,道家(包括儒家)渐次呈现出衰势,佛教自此而至北宋,一直是思想界最富创造力、影响最大的一脉。南宋以来,儒学援引佛、道并主要是佛教的理论要素而重获新生,其结果则是佛教的式微。至明中叶,由于外部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如朱元璋等的限制寺院经济,切断佛教与世俗的联系,强化寺院管理等,及代表官方思想的理学对佛学的不断责难、征伐)与内部创造活力的失却,禅伯僧众素质的低劣等,以致佛门凋敝不堪,成为有史以来最为颓败的时期。无异元来为此而感叹:“近世禅道凋零,人心狂悖,天下无真正知识导引后来,亦无真正学人参询善友。”(《无异元来禅师广录》)潭吉弘忍也云:“国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杂,宗道之祖,微亦极矣。”(《辟妄救略说》)即是对此状况的一种说明。而在另一方面,儒教则也因理论上的不断内部循环、缺乏更新(见阳明《别湛甘泉序》)及实践上的严重功利化、形式化趋势(见阳明《答顾东桥书》),面临着自程、朱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急需作出新的调整而将其导入迅畅发展的轨道。这样,便有了正德、嘉靖间由王阳明发动的心学运动,其结果是带动了整个学界基本思维模式的大规模转型,促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晚明思潮”。从学术性质上看,王阳明是代表儒学的一方并以恢复传统“圣学”的名义而提出整套思想改革方案的,但其学说的深层构造,也即理论得以起动的动力,却是来自佛教心性论,以致能最终摆脱儒学长期体内循环终至滞顿的痼疾(过去理学取佛的要素事实上已因内部循环消耗完毕),建立起一套向外开放、可供不断重新诠释的体系。从表面上看,阳明是忌讳言佛的,但又以为:“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重修山阴县学记》)即差异中仍存有本质上的同一之处,而此又恰是近儒所

匱缺的（又被称为遗落的），以致“世之儒者妄开窠径，蹈荆棘，墮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朱子晚年定论序》）。同样，拯救儒学也即是重新阐扬释、儒共有的直询自心的那部分内容，事实上是以佛解儒，以儒会佛。<sup>①</sup>

应当说，王阳明的这一努力是十分成功的，即使暂且不论其学说的意义及其得失，仅以其对学界的影响言，至少促动了两方面的积极反响。首先是在儒界，阳明生前广罗门生，推布心学，已形成较大的学术声势，阳明逝后，心学分化为多支，而各支的领袖人物又一面以广泛推行阳明学说为己任，一面则在阳明的基础上作了不同程度的创造性阐说，因各支所依的原始本文均自阳明，故都包含有最基本的佛学要素。但其中于时最具理论活力，在整个儒学领域最能刺激思维开拓，带动儒学向其命题终极行进的则是王畿为首的浙中学派与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也可总称为王学左翼。王畿虽为阳明故后之王学座主，但由于其重在讲述而对门派经营不甚关注，故无很明确的学谱，弟子多散于诸支脉之中。王艮的泰州学派则传承关系十分确定，正如李贽《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所述：“心斋（王艮）之后为徐波石（樾），为颜山农（钧）……云龙风虎，各从其类。……波石之后为赵大洲（贞吉），大洲之后为邓豁渠（鹤），山农之后为罗近溪（汝芳），为何心隐；

---

① 相似之论见于王畿的《三山丽泽录》：“先师尝有屋舍三间之喻，……及至后世，圣学做主不起，仅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间甘心让于二氏，及吾儒之学日衰，二氏之学日炽，甘心自谓不如，反欲假借存活。”“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佛），惟在俗（儒）耳。”徐渭《赠礼师序》亦曰：“大约佛之精，有学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粗，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学佛者反全之。”《赠张君序》曰：“……若然则二氏之说，宁非吾学圣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于儒？”袁宗道《说书类·引》也云：“三教圣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所谓学禅而后知儒，非虚语也。先辈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吾陵中。……闲来与诸弟及教友讲论，稍稍借禅以论儒，始欣然舍竺典，而寻求本业之妙义。”

心隐之后为钱怀苏（同文），为程后台（学颜），一代高似一代。”以王学左翼一脉而言，在近百年中大致上至少包括了五代人的发展，第一代即王阳明本人，第二代领袖为王畿、王艮，第三代为徐榭、王襃、王栋、颜钧、赵贞吉等，第四代为罗汝芳、耿定向、何心隐等，第五代为杨起元、周汝登、李贽、焦竑、管志道等。关于这一学脉传递叠进的情况我在另文中已作详尽考订，而其最为明显的一种态势，则是越往后去，入佛也就越深。如果说阳明还是一个甚具儒学色彩的人物，至二、三、四代则不仅理论上佛禅要素更为浓重，多方面引佛入儒，而且大多带有强烈的反叛性，即李贽在此意义上所说的“一代高似一代”。于此，各家也有不同说法，如袁中道《寿裕吾邹公偕元配张孺人七十序》中云：“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披云见日矣。而数传后，始有借解悟之说，以恣其无町畦之行者。”思想转折后袁宏道在《寿何孚可先生八十序》亦云：“夫阳明之学，一传而为心斋，再传而为波石，三传而为文肃，谓之淮南派。淮南王担荷，而其子孙喜为拔俗之行，……淮南之后而为悍然不顾……。”到了第五代诸人，则几乎都身涉佛门，成为所谓的“宰官居士”，并公开倡导儒、释合一，完全揭去了阳儒阴佛的护身面纱。如李贽，更是自觉投身寺院，以佛徒身份对旧儒作强力相抗。左翼王学的步步发展几乎与引佛入儒步步深入的趋势完全一致，这也就是“晚明思潮”的基本运动态势，它带动了整个社会意识的改造和人文风气的转变。

其次，阳明的援佛也刺激了酣睡已久的佛界，使其再度幡然觉醒，从侧里进入到时代思想的主流之中。这一传播程序在历史上有其特殊之处：尽管晚明佛学中兴仍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佛学内部成功地组织自身固有要素（如禅教合一，禅净合一等）也提供了新的转换模式，但心学方面的启发，甚至其后学的配合仍是



十分主要的动力。<sup>①</sup> 一个很简便的事例就是晚明的一些佛界师座如蕴空常忠、永觉元贤、汉月法藏、云栖株宏、藕益智旭等，均由儒入佛，其中既包括心学的影响，又包括在此之后对心学重点阐释的一般儒学命题的反应。如常忠“少时习姚江良知之学，尝以自有别见当揭明之”，又“独与罗近溪汝芳、邓潜谷元锡二公相与谈性命之学，间拈《金刚》、《圆觉》，发挥宗门大意，及举向上事，剖决良知，扫除知解，皆超出情见。”（道盛《建昌廩山忠公传》）元贤与法藏均为“以儒而入释”者，元贤又自述其“昔余居荷山，因诸儒有所问辩，乃会通儒释，而作《寐言》”（《鼓山水觉和尚广录·续寐言序》）。其中便涉及对阳明“良知”说的看法。法藏则将其所倡“看话头”与阳明“格物”说等视，以为“禅与圣道，一以贯之矣”（《三峰藏和尚语录》）。从晚明思想史材料中可以见到大量的心学家与佛学家的交往经历，有互相驳难的，也有互相启示的。尽管佛学家也一样固守佛、儒之间的基本差异，但为适应时代新形势的变化，又多提倡三教合一，并有时亦以佛释儒，或以儒释佛。这一命题与后期心学的旨趣是完全一致的，如真可《示阮坚之》云：“审名以精义，精义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东方圣人、西方圣人，必由之道也。”德清力倡“三教同源”，并言：“且佛，非西方圣人之称，即吾人自性之真。而尧舜禹汤，盖天民之先觉者。斯则，天民有得而能觉，圣人生之而先觉。此觉岂非佛性之觉耶？”（《法语·示容玉居士》）这样，就打破了长期

① 参见袁宏道《为寒灰书册寄郟阳陈玄朗》：“至近代王文成、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故余尝谓唐宋以来，孔氏之学脉绝，而其脉遂在马大师诸人。及于近代，宗门之嫡派绝，而其派乃在诸儒。”又梨洲《南雷文定·空林禅师诗序》言及浙东王学对佛学的具体影响云：“东浙宗风之盛，始于周海门（汝登）先生，湛然澄、密云悟皆缘之而起，其推波助澜者，则我外舅叶六桐先生……。是时姚江传海门之学者，有沈求如、史子虚、史子复、管震标、苏存方，皆以学佛知儒自任。密云之弟子，亦无能出幅巾之右。”